

高层 高知 高见 系列

面对 转轨之国

刘
伟
著

G A O C E

N G G A O

Z H I G A

O J I A N

中国发展出版社

面对 转轨之国

刘伟 著

G G A O Z H I G A O J I A N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对转轨之国/刘伟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2

(高层·高知·高见系列)

ISBN 7-80087-313-7

I. 面… II. 刘… III. 经济-文集 IV. F-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2523 号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 66180781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2 850 × 1168mm 印张: 9.25

字数: 178 千字 印数: 1—13000 册

定价: 17.3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 可向发行部调换

前 言

5737/19

中国发展出版社约我把近几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短文编成集出版。据说他们这一想法酝酿已久，后又经一些著名的前辈学者推荐，邀请了国内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各自编一本短论集。十分感谢出版社给予的这一机会，更感谢老先生们的信任。

既然是短论集，所选的文章大都不长，最长的不过五千字左右，短则千把字。内容虽然是经济学思考及经济政策观察或对经济事物的点滴看法，但很不同于专著，甚至不同于我曾出过的论文集，涉及的问题十分庞杂，也不可能有更多、更从容的剖析。或许有意义的是，文章大都直抒观点，更有一份坦白。

这里所选的短文，在时间上除三篇外大都是近几年见诸报刊的，相当一部分是选自报纸上曾刊出的，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刘伟：面对转轨之国

2

的稍长些的论文概未编选。除个人所写的文章外，收进了几篇为他人著作所作的序，同时收入了几篇记者的访谈，因为我觉得其中反映了一些有意思的个人观点。

刘 伟

1998年9月25日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目 录
1

目 录

中国旗帜 发展旗帜	1
发展——根本的历史命题	3
发展的奇迹 改革的奇迹	
——党的十四大以来改革与发展轨迹的历史回顾	12
香港回归：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机遇	23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矛盾症结：国有企业	26
灾区重建须特别重视“发展成本”	32
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特点	35
特殊命题 历史命题	43
今后 20 年左右中国所有制变化的趋势	45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焦点：如何对待国有制	53
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双重转轨的历史要求	58
区域经济发展与所有制改革	67
经济“软着陆”与所有制改革	7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首先在于产权的 纯粹经济化	86
走出企业产权改造的误区 ——访谈录	89
关于资产权利结构改造中的企业法人产权	97
择路难题 体制难题	105
国有大中型企业：路在何方 ——访谈录	107
谁来支付企业改革的成本	111
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经验及发展趋势	116
对“政企分离”认识存在一个深化的历史过程	125
“放小”必须处理五大问题	130
国企改革的体制性难题	139
现实挑战 历史挑战	147
全面认识和综合处理我国的再就业问题	149
政府调控的发展目标和体制目标导向	157
推进三大产业结构高度是实现发展的实质	168
中国民营企业像棵小老树吗	173

目 录

3

地方利益制约宏观调控	176
谁在推动通货膨胀	179
迎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的历史性挑战	187
产业冲突 利益冲突	199
第三产业与国民收入	201
如何认识金融秩序的混乱	209
经济双重转轨中的体外循环 ——访谈录	213
金融秩序建设中的利益冲突	218
道德秩序 经济秩序	227
精神文明·体制目标·发展目标	229
论转轨时期公民素质的提高	235
失信的病根何在	245
打假与浮夸	247
贪污与贪吃	249
怎样看待社会集资	251
探索艰难 转轨艰难	255
高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帜 ——纪念孙冶方先生诞辰 90 周年	257
经济科学的建设需要开放	265
《转轨的中国》序言	268

刘伟：面对转轨之国

4

《公平与效率——制度分析》序言	271
《企业超速成长》序言	276
《股份制改造实务》序言	282
企业家精神：创新·责任·集体主义	285

中国旗帜 发展旗帜

发展——根本的历史命题

加速经济发展，尽可能迅速摆脱经济落后，是我们面临的根本历史命题，是进行改革的基本动因和目的，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因此，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多次强调必须加快发展速度。但人们对此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这个历史命题的把握也常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就表明，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更加准确地理解加速经济发展这一历史性命题。

一、加速经济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阶段的历史要求

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含义，但经济发展无疑是发展命题的核心。这首先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以及由此而造

成的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决定的。可以说，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之所以存在种种矛盾，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发展水平不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在人均 GNP 水平上，进入 90 年代，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人均 GNP 为 350 美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 GNP 为 2220 美元（其中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均为 1530 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 GNP 为 3410 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 GNP 为 19590 美元（其中发达国家，OECD 国家为 20170 美元）。同期，我国人均 GNP 为 360 美元，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50 美元），距发达国家水平（20170 美元）相去甚远。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技术和体制不变，假设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每年保持比发达国家快一倍的 GNP 增长速度，低收入国与发达国家人均 GNP 水平上的差距何时才开始缩小？计算结果是第 130 年之后二者的差距开始缩小（注意，只是差距不再扩大，尚远不是指二者相等）。并且，发展中国家在 130 多年里是否能够始终保持比发达国家快一倍的增长速度并不是十分确定的。

中国作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若以人均 GNP 水平作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与发达国家距离不能以落后十几年、几十年而论，而是要以世纪论。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差距，中国经济不加速发展行吗？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自 1980 年到 21 世纪 50 年代赶上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际上是以承认我国发展水平较最为发达国家落后百年为前提的，并在此前提下提出加速赶超的目标。如果从产业结构上

看，面临的赶超任务则更为艰巨。在工业化未完成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关键取决于农业在效率和产出提高的前提下，其相对比重下降的程度；或者说，非农产业在农业效率提高基础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相对比重的扩张程度，这是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质的标志。以此为标志，现阶段，在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上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 57% 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在 6% 以下，我国比发达国家高出 50 个百分点；在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上，我国现阶段农业产值比重为 20% 略强，而发达国家则在 3% 左右，我们与之相差 17 个百分点。我国目前的这种产业结构高度，大致相当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水平，差距也近百年。这就又从经济质态上提出了加速发展的历史要求，而且应该看到，缩短经济质态差距是相当艰巨的。如果说数量上的差距在短期内还可能见到改善的成效，那么，结构上的差距则在短期里难以见到显著缩小的成效，因为结构差距缩小反映的是整个经济质态的变化，需要长期增长的积累。

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要求必须加速经济发展，这一点在改革开放 18 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变得愈加强烈和迫切。

二、加速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的转变， 并不在于简单的数量扩张

如果把完成现代工业化作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目标，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以现代工业、制造业替

代和改造传统农业，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切实使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工业化。这一进程，与其说是数量增长的过程，不如说在本质上是经济结构发生根本转换的过程。

以结构转换为本质内容的经济发展，其进展过程当然离不开经济增长，发展是在经济数量不断扩张过程中实现的，但增长不等于发展。因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数量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GNP 指标、工农业产值指标增长了，但同时国民经济结构却没有随数量指标的增长而有所改变。比如我国自 1952 年至 1978 年，国民经济总量逐年扩张，增长率也在 10% 以上，但结构变化不大，农业就业比重仅由 82% 降为 70%，不到 1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不仅未上升却反而有所下降。因而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并未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无明显改善。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的某些时期也曾出现过。以发展经济学的标准进行评价，一个国家在年度之间经济总量发生了增长，数量指标均有所提高，但却是与以往一样同比例的提高，数量扩张后结构仍同以往一样，那么就可以认定该国经济虽有数量增长，但却无结构转变意义上的发展。实现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并不很困难，因为经济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数量放大，不要求技术进步，只要求增大投入，在短期里即可见效，年度之间便可显示出效果。但要实现结构转换意义上的发展就不容易了，因为它要求各部门的增长、扩张以不同比例、不同速度进行，因而不仅要求增大投入，尤其要求技术进步，要求不同产业间技术进步率不同的技术创新。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加速经济发展，最根本的不

在于加速数量扩张，尤其不在于强调扩张数量指标的高速度。加速数量增长若不是在结构升级的前提之下，就不符合发展的本质规定，不仅推动不了经济有效发展，反而会从根本上损害发展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数量增长，必须是在结构质态转换中的，是在产业结构效益、技术进步率不断提高过程中的增长。所以，作为距离发达国家结构质态落后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所面临的加速经济发展命题，关键在于加速技术进步，加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结构转换，即经济质态水平的提高，切实缩小在发展质态、发展阶段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数量指标上的，如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的差距，说到底还是结构质态差距的数量体现。

应该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具有加速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也具有实现的历史可能。

一方面，从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纵向地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比，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规定的发展阶段大体与主要发达国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相似，尽管与不同国家相比较，与其最为接近的历史年代并不相同，这是由于各国工业化的历程在时间上有先有后；但在经济历史内容上，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进程相比，都是一致的，即均与其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结构最为接近。横向地与当代世界经济相比，就三大产业产值结构而言，我国现阶段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分别是 18%、49%、33%，这一结构与当代世界下中等收入国较接近，当代世界下中等收入国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为：17%、33%、50%。其

中由于体制的历史原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我国差别较大（50%：33%），但在反映工业化进展水平上的第一产业比重极接近（17%：18%）；就三大产业就业结构而言，我国现阶段大约为57%、22%、21%左右，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大致为54%、17%、29%左右。下中等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再到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恰恰也是工业化进展最为迅速的发展时期。因此，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比，还是与当代世界经济各类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现阶段均为工业化加速期。从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结构变化迅速。无论是日本、德国，还是英国、法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结构变化率最高的，即产业结构变化速度（结构变化值）最快的时期，均是工业化加速期。也就是说，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的我国，实现高速发展，即高速的结构转化是有经济史的内在根据的，发达国家历史上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均是以高速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数量增长速度也十分快，但发展意义并不突出，以最体现发展难度的就业结构为例，自1952年至1978年26年里，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不到13个百分点，结构变化值仅为25.6；而1978年至1994年仅仅16年，我国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便从70.7%降为57%左右，下降13个百分点以上，结构变化值达到25以上。对我国来说，最具有发展价值的，并不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数量的扩张，而在于结构的迅速演变。

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能够加速结构转换以实现加速发展的重要可能还在于，能够享